

## “中国道路”的争议和思考<sup>〔\*〕</sup>

○ 郎秀云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关于“中国道路”的研究蕴涵种种不同的理解和评价,存有许多争议和分歧,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道路”是否存在、“中国道路”的内涵、历史起点和跨度、特征与经验,以及“中国道路”的评价等问题上。一些学者对“中国道路”持怀疑态度,认同“中国道路”的学者对其内涵、特点、意义等问题也未达成共识。准确解读“中国道路”的内涵,科学阐释“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总结中国经验是研究的重点。“中国道路”的成功源于独立自主和变革创新,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在现代化理论、制度、观念基础和技术基础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创新。

〔关键词〕“中国道路”;起点;内涵;特征;实质;经验;价值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与世界影响力的显著提升,近年“中国道路”成为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议题。国际社会从关注“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到探究“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成功之道以及世界影响,研究视角逐渐多元和深入。囿于观察视点、立场、目的导向以及论证逻辑之差异,对“中国道路”的理解和评价也不尽相同。需要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炼“中国道路”的内涵、特征、价值,以提升我们坚持“中国道路”的自觉和自信,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理解和认同。

### 一、关于“中国道路”的全球论争

#### (一)关于“中国道路”的概念之争

---

作者简介:郎秀云,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应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的战略与路径选择研究”(项目编号:12&ZD077)阶段性研究成果。

## 1. “中国道路”是否存在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给予了大量密集的关注,撰写了相当数量的论文、著作、调查报告、新闻报道。从这一概念被提出开始,围绕着是否有“中国道路”的争议就一直存在。中国究竟有没有自己的道路,如果有“中国道路”存在,那么她与西方的道路又有什么不同,为什么需要不同和如何可能不同?这是讨论的逻辑起点。

西方有学者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道路”。中国过去发展的道路只是“华盛顿共识”的成功案例或者东亚模式的模仿而已。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尽管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华盛顿共识的主张,诸如建立健全的市场、保护产权、稳定宏观经济、执行稳健的财政政策等。“中国做的这些事情和标准的经济学告诉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没什么差别,跟‘华盛顿共识’实际上没什么差别。‘华盛顿共识’如果要找成功的案例,中国大概应该是一个。”<sup>[1]</sup>美国的社会学教授乔尔·安德斯(Joel Andreas)认为,中国走的是东亚道路,其特点是强大的国家、活跃的家庭劳动经济和主要由小企业组成的私有经济和小规模资本主义经济。<sup>[2]</sup>

当然更多学者认为,“中国道路”是根据中国的国情、特点、发展阶段等通向现代化的一条发展路径,它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则认为中国开创了世界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可以作为对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一种替代选择。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季塔连科认为,今天的中国,没有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而是经过对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总结各个国家的经验,在汲取精华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sup>[3]</sup>英国作家威尔·赫顿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非常独特,极具中国特色,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待资本主义,它从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它融合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原理,但又受到国家的指导,而国家时刻牢记必须提高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sup>[4]</sup>还有学者认为,“中国道路”独特之处就在于: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既定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下进行的。中国既没有像依附理论那样,完全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脱钩,闭关自守地进行现代化;也没有像“华盛顿共识”那样,采取私有制、全盘西化和激进性变革的方式,而是根据中国改革所能承受的限度和改革的需要,在保证国家经济政治安全的前提下,逐渐扩大开放的领域,在改革和开放中增强国民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能力。<sup>[5]</sup>杨承训认为,“中国道路”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一条非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体现在:一,历史进程不同。基于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着世界上其他国家。三,西方发动了无数非正义的战争。四,西方实行的是剥削制度,两极分化严重。<sup>[6]</sup>安德烈·卡尔涅耶夫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存在相似点。但是,中国的实践仍体现出其自身的特点,从而使中国

与其他国家区分开来。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财富分配、外部竞争力的构建、产业发展政策。<sup>[7]</sup>还有学者认为,“中国道路”不同于苏联模式,是一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现代化道路。<sup>[8]</sup>

## 2. 关于“中国道路”的内涵、历史起点和时间跨度的分歧

尽管众多的文章都在讨论“中国道路”,但细究下来,是在不同的层次上使用这一概念,对“中国道路”的内涵的理解并不一致。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应定位于1840年鸦片战争,到现在已跨世纪而历经170多年。<sup>[9]</sup>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是近代120年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探索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民族解放、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1880年代末至1890年代初,“中国道路”的探索进程已经拉开大幕。<sup>[10]</sup>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中国道路”,1921年是起点。<sup>[11]</sup>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之路,起始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包括了建国以来60多年的历程。朱佳木指出,“中国道路”,不仅有改革开放后的历史,而且有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两个30年之间虽然存在很大差别,但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社会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两个30年共同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离开其中任何一个30年,这条道路都不可能是完整的。<sup>[12]</sup>第五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是在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实现之年,也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步之年,标志性起点是1956年4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提出。<sup>[13]</sup>第六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就是指我们坚持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开辟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sup>[14]</sup>。

### (二)关于“中国道路”性质、特征之歧

由于关注的立场、视角、方法等不同,国内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的性质及特征方面存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1. 性质之歧。对于“中国道路”的性质,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利益代表的人士有不同的判断,共有八种观点。观点一,国家资本主义,以伊恩·布里默、美国前国务卿赖斯、韩丁、约书亚·科兰兹克、威尔·赫顿等人为代表。伊恩·布雷默在《自由市场之终结》一书中,把“中国道路”归结于“极权政府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经济上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干涉经济的能力。观点二,封建资本主义。日本综合研究所首席高级研究员吴军华、早稻田大学教授毛里和子、中国学者李泽厚等人强调中国儒家文化、封建官

僚主义等在中国发展中的作用。李泽厚认为,现在的中国是有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就是官本位,政府权力过大。也有学者将中国的经济制度称为权贵资本主义或权力资本主义。观点三,非资非社。波兰科学院哲学和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亚当·沙夫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中国式社会主义,也不是中国式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的社会形态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无法给予明确的界定。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与经典社会主义相异的“第三条道路”。观点四,“既资又社的混合体”。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Э.皮沃瓦罗娃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一种聚合的‘混合经济’,各种生产力水平参差不齐,各种形式所有制经济并存,各种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并存。”<sup>[15]</sup>法国学者罗兰·列夫认为,中国的“现实社会主义”,事实上是混合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种“现代化”的新颖形式和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变种。<sup>[16]</sup>观点五,儒家社会主义。甘阳认为,“从长远的意义看,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如果得到健康的发展,将有可能逐渐突显‘中国道路’的真正性格,这就是:中国的改革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形成一个像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达成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sup>[17]</sup>观点六,市场社会主义。美国学者普兰纳布·巴德汉(Pranab Bardhan)与约翰·罗默(John E. Roemer)认为,中国是市场社会主义道路的代表。美国学者大卫·施韦卡特则认为中国处于市场社会主义早期阶段。<sup>[18]</sup>观点七,后社会主义,美国学者德里克用“后社会主义”一词界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走的道路,“后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在社会主义的危机中提供了以新的和更具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的可能性。”<sup>[19]</sup>观点八,中国式社会主义。俄罗斯学者季塔连科认为,“在某种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新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以其独特的形式(在中国条件下)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从革命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总的发展趋势,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复杂演变过程并最终反映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完善”。<sup>[20]</sup>黄仁伟指出,“中国道路”坚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二者的区别就在于“中国道路”是为全体中国人民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sup>[21]</sup>

2. 关于“中国道路”的特征的争议。由于观察视角不同,目的不同,关注内容和对象不同,在“中国道路”究竟有哪些特征的问题上也存在一定分歧。一些学者主要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而有些学者强调“中国道路”的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等诸多角度。陈平认为,“中国道路”的经济特征是:(1)混合经济的健康发展,远胜过东欧的全面私有化。(2)政府角色重新定位为“规划协作之手”,其务实效果远超过自由放任的“看不见的手”。(3)价格是国际竞争的手段,而非发展战略的主宰。(4)中国创造了市场经济下民主制衡的新方式。(5)中国发展了新的公平模式。<sup>[22]</sup>房宁认为,“中国道路”的民主特征是:第一,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把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统一起来。第二,在工业化阶

段,选择协商民主为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方向和重点。第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循序渐进不断扩大和发展人民权利。第四,在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中,采取问题推动和试点推进的策略。<sup>[23]</sup>也有学者解析“中国道路”的社会特点,认为具有两个规定性:一是实现了社会形态的局部跨越,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二是实现了现代性的内在超越,中国现代化道路不再重复西方现代化历程中的一切苦痛。<sup>[24]</sup>

还有一些学者从多元视角对“中国道路”进行了综合分析。张唯为认为,可以用“实事求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五位一体”三个关键词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征。<sup>[25]</sup>严书翰认为,60年来,中国发展道路的特点可以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加以概括。<sup>[26]</sup>章传家则指出,“中国道路”所具有的科学性、人民性、时代性、开放性这些内涵特质,使这条道路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在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杰作。<sup>[27]</sup>姚洋总结了“中国道路”的四个特征:社会平等、贤能体制、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中性政府。<sup>[28]</sup>郭万超认为,“中国道路”有五大特性:自主性:“中国道路”是立足中国国情自主探索出的,具有浓厚的本土化特色;人民性:“中国道路”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最大限度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实践性:“中国道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其顺利成长的基本原因;整体性:“中国道路”坚持“五位一体”的有机统一,从而实现了发展合力最大化;稳定性:“中国道路”的关键秘诀是科学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sup>[29]</sup>刘应杰认为,“中国道路”的特点体现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制度、差异化发展战略、国家宏观调控、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sup>[30]</sup>欧阳康认为,一元主导、多样并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构特征。“一元主导”是指坚持社会主义因素的一元化主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全局;“多样并存”是指允许和鼓励多种非社会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多样共存、健康互动、共同发展,使社会更加丰富和富于活力。

与国外媒体和学界避谈、甚至贬损中国制度不同,中国学者强调,成功的发展道路背后一定有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失败的制度不可能产生成功的发展道路。王国敏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着非常丰富的绩效内容,它有着维护国家稳定、为社会成员提供足够的公共品、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利益表达和参与渠道的四大基本功能,其本身也是一种具有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能力的制度,具有强有力的自我调节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道路’成绩背后的驱动力”。<sup>[31]</sup>黄仁伟指出,中国发展道路成功的真正秘诀,也是最重要的条件,就在于坚持这条道路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发展道路具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站在时代前沿,谋划长远全局,而且能够制定切实的发展战略并付诸实施。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政党

相比的另一个巨大优势,就是它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检验和创新这个理论体系。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能够突破种种束缚,大胆开辟历史上所没有的道路,也能及时发现失误并加以纠正。<sup>[32]</sup>还有学者认为,“中国道路”给世界启示,社会主义制度、强有力的政府、混合经济、宏观调控,同样可以成为现代化的成功元素。<sup>[33]</sup>

### (三)关于“中国道路”的评价和未来发展不同理解

对于“中国道路”,支持、期待、炒作、捧杀、质疑、忧虑、牵制、敌意、围堵者应有尽有,给出的评价也各不相同。一些人士根本否定“中国道路”的存在与成就。还有学者对“中国道路”大加赞扬,认为“中国道路”将取代西方道路,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选择。

1. 否定性评价。否定“中国道路”的大致有三种说法。(1) 否认中国的发展。在一些学者看来,并无“中国奇迹”。首先,中国取得的成就仅限于经济数字的增长,社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仍将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之列。其次,中国发展的代价高昂,低成本、低人权、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可取。再次,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两极分化现象已日益明显,没有实现共同富裕。(2) 否认中国的发展与“中国道路”的关系。一些学者尽管承认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但认为,中国创造奇迹的方式,与荷兰、英国和美国的早期发展以及东南亚诸国并无二致,没有打破正常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的进步是搞了市场经济回归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结果,是“搭便车”的结果,西方国家的资本、市场、技术和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结合成就了“中国奇迹”。如陈志武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佐证了自由选择和市场化会带来繁荣”,“是自由市场、普世人性战胜权力管制的结果,是全球化力量的具体表现。”<sup>[34]</sup>(3) 否认“中国道路”的可持续性。有一些学者认为,不应被中国所谓的成就蒙蔽,应该看到中国问题很多,疾患深重,难以持续。甚至有国外学者预言,中国会像前苏联一样在高速增长中突然走向崩溃的宿命。国内也有相似的观点认为,“中国道路”的第一个三十年走的是极权政治加统制经济的道路;第二个三十年走的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道路,即权力市场经济道路。这条路也很难走下去。最终中国要走向西方道路。<sup>[35]</sup>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中国特色的道路,就是选择适合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sup>[36]</sup>

2. 肯定评价。肯定“中国道路”的学者一致认为“中国道路”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有重要影响,但就“中国道路”的影响力的大小和作用的范围的评估上,还是存在一些分歧。概括起来有三种评价: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成功挑战了西方道路,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示范效应。郑彪认为,“中国道路”从理论到实践,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各方面都颠覆了两百年来引导人类文明发展的西方道路、西方模式、西方中心论、西方至上等等诸如此类的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道路”具有革命意

义,是一场对西方文明的统治地位及其主导的当代世界秩序的革命,并不算夸张。<sup>[37]</sup>潘维指出,“‘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成功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知识里的‘市场与计划两分’,西方政治学知识里的‘民主与专制两分’,西方社会学知识里的‘国家与社会两分’”。<sup>[38]</sup>周弘认为,“中国道路”丰富了人类的社会实践,挑战了西方经验唯一正确的神话,中国将市场和社会主义管理有机结合的国家结构也会通过继续的自我完善而影响到市场主导的世界力量格局。<sup>[39]</sup>陈学明认为,“中国道路”代表了一种对真正的人的生存状态的追求,是对正处于危机之中的西方文明支配下的那种人类存在方式的革命,为人类文明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sup>[40]</sup>“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sup>[41]</sup>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也有学者认为,“中国道路”对发达国家来说价值有限,但在发展中国家可能魅力无穷。“中国道路”破解了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难题:一是打破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对西方的路径依赖;二是有效克服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后发劣势”;三是成功破解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普遍面对的“发展”与“稳定”、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两难问题,<sup>[42]</sup>能够满足现代后发展民族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反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和“华盛顿共识”的现代化新路。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俞可平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道路”的价值,看作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建立在这种特殊国情基础上的“中国道路”,恐怕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地效仿的。而且,我们的现代化任务还没有完成,“中国道路”并没有完全定型,探索的路途还很长。以为“中国道路”已经是一条成熟的现代化道路,既可解决国内发展中的一切问题,又可供他国模仿,这不仅过于乐观,而且对我们解决目前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甚至是有害的。“中国道路”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sup>[43]</sup>

## 二、关于“中国道路”的思考

### (一)中国道路具有不容否定性

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历史条件是多样的,人类文明的道路也应是多样的。马克思曾用“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来表达这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中国展现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即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是由近现代中国所处的世界格局、国情和面临的基本问题、历史任务决定的,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历史不断演变、不断积累的必然结果,是客观发展的历史进程,具有不容否定性。“中国道路”尽管只有 90 多年的历程,还存在一些待解的难题,但是,这条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使具有 5000 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sup>[44]</sup>没有普遍适用的所谓“中国模式”,确有“中国道路”。

(二)“中国道路”是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的过程,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文明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中国道路”的界定有两种倾向,一是,把“中国道路”锁定为近三十年的中国发展,将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特点定义为“中国道路”,理解为当下的概念而非历史性概念。二是,把“中国道路”推演到 1890 年代乃至 1840 年,把近代以来的中国历程等同于“中国道路”。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

其一,把“中国道路”锁定为改革开放 30 年是不恰当的。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看,“中国道路”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辟世界的过程中,中国遭遇到西方入侵,面临民族危亡和文明危机下的历史背景下,为救亡图存,经历了“以欧美为师”的种种尝试,在诸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另寻出路,最终纳入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中国道路”可以概括为,一个受压迫民族的解放和复兴的过程,或者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文明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这是中国社会的艰难而伟大的转型,“中国道路”艰难、曲折而漫长。

近代中国始终面临着两个重大课题:一个是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实现国家独立,一个是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对这两个重大课题的科学回答构成了“中国道路”的双重规定。处于列强环伺的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只有通过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才能获得其客观的基础,革命是“中国道路”第一步。中国共产党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置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改变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获得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不仅为社会主义创造了前提,而且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开辟了现实的道路。第二步,创造性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中国发展的制度基础和初步的物质基础。第三步,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革命,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尽管中国的现代化成就直到今天才得以彰显,但是几代人接力探索的成果。从历史的轨迹看,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改革开放并非是历史的断裂,也不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背离,而是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继续。改革开放是“中国道路”的一个阶段,不能涵盖“中国道路”的全部。历史不容假设,道路不能割裂。以历史否定现实,或者以现实否定历史,都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道路”的内涵,都不符合道路自信的要求。

其二,把“中国道路”的源头上溯到1890年代或者是1840年显然不妥。1840年以来,西方文明借助于其现代化的“船坚炮利”入侵中国,为救亡、救国、兴国,无数仁人志士开始探索现代化发展之路,农民革命、自强运动、和平改良、民主革命相继发生,从继续维护封建集权帝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变动甚为迅速;在思想观念上,从最初的“师夷长技以治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全盘西化”。这些尝试固然提出了现代化的一般目标,但很少顾及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很少注意“现代性”的“中国化”问题。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力图“按照自己的社会情形”,寻找一条“驾欧美之上”的现代化道路,然而并没有成功。尽管我们不能否认先驱者们探路的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但也应看到,这些现代化的尝试,“始终在抄袭外国和回归传统之间摇摆,时断时续,杂乱无章,不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sup>[45]</sup>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中华民族既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也没有实现国家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直至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未能找到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在此之前的探索,只能算作是“中国道路”的“前史”阶段。

(三)“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井冈山道路的开辟是标志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欧洲民族国家崛起的资本主义本质,为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中国指出了一条超越资本主义“西化”模式的新的道路。“走俄国人的路”成为中国先进分子重觅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时代结论。“走俄国人的路”至少有三重内涵:一是社会主义方向,二是通过社会革命取得无产阶级专政,三是具体的革命道路。不可否认,立党之初,最为中国共产党人所认知的是具体的革命道路。直至“八七”会议,党对“走俄国人的路”的理解侧重的是以城市为革命中心的革命道路。这种“苏维埃革命”的俄国模式,虽然为中国选择了一条超越西方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脱离中国现实而难以实际运作致使中国革命甚至一度曾因将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而吃够了“俄化”的苦头。面对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反思“城市暴动”的革命道路,走上与俄国人相反的道路,这就是“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即井冈山道路。唯当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中国问题不应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时,才开始取得自身的立足点,才开始有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也才开始有真正的理论和实践创新。<sup>[46]</sup>2007年胡锦涛同志指出“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

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sup>[47]</sup>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道路”的选择成为现实，“中国道路”的起点应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 (四)关于“中国道路”的性质

快速变革发展的中国从现象看很复杂,不仅社会主义因素(目前在我国是占主导地位的因素)、资本主义因素和前资本主义的落后和腐朽的因素并存,而且,巨大的成就与巨大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把握其发展主流和基本趋势,全面客观地看中国实属不易。怀疑甚至否定“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论者,大多数是未能抓住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主导方面,只是抓住了其中的某些特征和问题,在此基础上把某些方面的特征和问题加以放大甚至扩展为整体,由此得出了“盲人摸象”式的片面结论。

受制于国情与起点的制约,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甚大,还需要利用资本,甚至还存有封建势力的残余,但并不能据此断言中国的资本主义性质或封建主义性质。把握“中国道路”的本质,应该看到,“中国道路”奠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这决定了其社会主义的历史基因,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民族经济的一体化、自主发展、政治和经济的主权以及社会平等”<sup>[48]</sup>内在地成为“中国道路”的基本规定。90多年来,“中国道路”一直遵循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毛泽东终生致力于走出一条公平与效率并重、实现现代化的同时避免两极分化的道路。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搞两极分化。江泽民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今天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中国道路”志在追求“人与人的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解”,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尽管由于所处的社会基础尚未超越资本逻辑统治的全球化时代,当前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公私并存、社资兼有的,经济关系具有过渡性、两重性特征,但中国一直坚持“一元主导”的根本原则:在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形式上,坚持以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在政党制度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在意识形态上,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这种“一元主导”表明中国已经不再高攀一种作为乌托邦理想的社会主义,但也决不会“低就”资本主义。

不过,我们也应实事求是地承认,尽管“中国道路”的志向和目标是最终否定和超越资本主义,但在目前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因素还不够充分。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合,让社会主义切实成为规避资本异化的根本力量,是未来“中国道路”最为重要的任务。

#### (五)“中国道路”的评价和价值

“中国道路”给世界带来的意义,不在于要挑战西方道路或模式,也不是要向全球输出。世界上没有一个最好的现代化模式,没有一个尽善尽美的体制,只有最适合自己的道路,不同发展道路的优劣比较一定要谨慎。“中国道路”的提

出,其主旨在于,说明我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证明“独立自主的探索”是最重要的。根据自身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是各国人民拥有的自主权利,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法则。“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sup>[49]</sup>

对“中国道路”的评价,我们要客观理性。一方面,面对外界的质疑、否定的声音,不应妄自菲薄。“中国道路”成功与否,发言权并不在西方学者。“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中国人民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刻变化中,从衣食住行的持续改善中切身感受到“中国道路”走得对、行得通。今天我们已经迎来了民族复兴的曙光,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民族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道路自信。另一方面,面对各种对“中国道路”的热捧,我们不能妄自尊大。道路自信不仅建立在已有的成就基础上,而且更需要有理论的自觉反思: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复兴尚处于进行时态,中国的现代化还在路上。“中国道路”还不是一条公认的成功的现代化道路,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中国只是为破解现代性危机做出了初步的探索,对西方道路的超越还是有限的和不充分的,而且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这种超越都将是有限的和不充分的。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的难题,还处在不断调整、完善和探索新的可能性的过程中。破解现代化的难题,中国既不可能从历史传统中、也不可能从他国经验中发现答案,而是要在现代化理论、制度、观念基础和技术基础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创新。“中国道路”的成功源于独立自主和变革创新,未来中国的发展尤其是道路选择也需要独立自主和变革创新。

### 注释:

[1][美]乔纳森·安德森:《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余江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165页。

[2]Joel Andreas,“Changing Colours In China”,New Left Review,2008 Nov./Dec.

[3][美]季塔连科:《中国的探索对世界有深远意义》,《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1月7日。

[4]刘志明:《中国道路成功的根本原因》,《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期。

[5]尹倩:《“中国模式”的借鉴意义》,《理论与现代化》2009年第4期。

[6]杨承训:《中国道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研究》,《学习论坛》2004年第11期。

[7][俄]安德烈·卡尔涅耶夫:《东亚模式与中国模式》,《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5期。

[8]鹿元正:《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若干思考》,《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6期。

[9]贺新元:《辩证思维下的“中国道路”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6期。

[10]王庆五:《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11]宣兴章:《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当代世界》2010年第8期。

[12]朱佳木:《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3]李慎明:《八大前后开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当今中国的发展壮大》,《当代中国

史研究》2006年第5期。

[14]秦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体系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1期。

[15]徐元官:《俄罗斯学者关于新中国60年发展经验教训评价之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2期。

[16]徐觉哉:《国外学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3期。

[17]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读书》2007年第6期。

[18][美]大卫·施韦卡特:《经济危机视角下的资本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0期。

[19][美]阿里夫·德里克:《重访后社会主义: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吕增奎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5期。

[20]秦益成:《国外学者政要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21][32]黄仁伟:《中国道路的历史超越和国际解读》,《求是》2012年第21期。

[22]陈平:《中国道路的本质和中国未来的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3期。

[23]房宁:《中国道路的民主经验》,《红旗文稿》2014年第6期。

[24]吴波:《社会形态与现代化双重视野中的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7期。

[25]陈叶军:《张维为:中国道路探索与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中国社会科学网,2013年1月28日。

[26]严书翰:《中国发展道路的世界影响》,《克拉玛依学刊》2011年第1期。

[27]章传家:《坚定当代中国的道路自信》,《光明日报》2012年12月30日。

[28]姚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1期。

[29]郭万超:《论中国道路的五大大特性》,《党建》2013年第9期。

[30]刘应杰:《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十个特征》,《人民论坛》2012年第15期。

[31]王国敏:《关于“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问题的再探讨》,《理论探讨》2014年第1期。

[33][42]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国道路破解了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难题》,《求是》2014年第5期。

[34]陈志武:《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台北:八旗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35]杨继绳:《“中国道路”能走多远?》,FT中文网,2013年9月23日。

[36]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4页。

[37]牛玉峰:《深入研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

[38]吴强:《中国经济模式是走向成功的模式》,《红旗文稿》2010年第8期。

[39]周弘:《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40]陈学明:《当代语境与人的存在方式——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哲学思考》,《学术前沿》2012年第8期。

[41]徐觉哉:《世界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0期。

[43]俞可平:《“中国模式”与思想解放》,《北京日报》2008年11月19日。

[44]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1日。

[4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7页。

[46]吴晓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怎样的国际视野》,“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年11月26日。

[47]新华社:《胡锦涛强调大力弘扬崇高革命精神和优良革命传统》,“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7年7月27日。

[48][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不应抛弃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

[4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9页。

[责任编辑:嘉 耀]